

美学的浪漫主义和政治学的浪漫主义

俞兆平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体系中的浪漫主义主要有两大类: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和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前者的内涵侧重于对人类文明及科技理性发展所带来的负值效应的忧虑、质疑与抗衡;后者则把浪漫主义当成隶属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中的一种成分,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30年代后的中国,政治学的浪漫主义排斥、取代了美学的浪漫主义,在具体文艺实践中带来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现象。实质上,郭沫若与沈从文就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界的不同的命运。

关键词 浪漫主义 美学 政治学 异化

作者俞兆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的文艺理论体系自20世纪初引进西方浪漫主义概念以来,对其内涵及功能等虽然屡有争议,但多局限在文学艺术的范围内,而未能从跨学科的角度予以鉴别,也缺乏从更宽阔的历史语境中作一番寻根溯源的考察。因而,有关的论争往往是争而不决,论而无果。最终仍然是各执一辞,各立其说。以至于在今天的一些教科书及论著中,仍然不时出现“作为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等提法。惯例习俗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是强大的,往往以一种无形的、不容置疑的力量左右着人们的思考与判断。因此,从新的角度楔入,着重对中国文艺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两种浪漫主义体系——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和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进行一番深层的考察与对比,将有可能推进我们对浪漫主义问题的理解。

一、卢梭与美学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一个意义庞杂、内涵宽泛的概念。它的身上垒积着前人从不同立场、不同视野赋予它的东西,叠加着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思潮的要求与使命,以至于一些学者发出慨叹:“什么是浪漫主

义?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正像对美的本质的追寻一样,在浪漫主义论题上,要想获得一个世上公众一致认可的、绝对精确的概念也是不可能的。但不能由此而拒绝了相对性的界定,至少在学科域限上可以作出界分。后者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界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我们从未明确地在这一向度上做过辨析的工作,我们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浪漫主义交织着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重内容,是政治学等和美学的混合体。由此,导致了文学理论进入实践课题研究时的困境。例如,沈从文曾自封为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浪漫派”,对于他的这一自白,一些研究者便显得茫茫然而无法应对。

浪漫主义不像现实主义一样,仅仅局限于文学艺术的范畴,它具有跨学科的意义。勃兰兑斯曾对19世纪的浪漫主义作过这样的概述:“浪漫主义曾经几乎在每个文学部门使风格富有新的活力,曾经在艺术范围内带来了从未梦想过的题材,曾经让自己受到当代各种社会观念和宗教观念的滋润,曾经创造了抒情诗、戏剧、小说和批评,曾经作为一种滋润万物的力量渗入了历史科学,作为一种鼓舞一切的力量渗入了政治。”^①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浪漫主义概念运用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它不仅涉及到文学艺术,而且还渗入到历史科学、政治等。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论及“浪漫主义运动”一章时也写道:“浪漫主义运动在初期跟哲学并不相干,不过很快就和哲学有了关系。通过卢梭,这运动自始便和政治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必须先按它的最根本的形式来考察它,即作为对一般公认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的反抗来考察,然后才能了解它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的影响。”^②这里,浪漫主义涉及到了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美学,学科界域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的范围。

卢梭,罗素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并予以这样的评判:“是从人的情感来推断人类范围以外的事实这派思想体系的创始者,还是那种与传统君主专制相斥的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③卢梭为绝对化的情感主体和伪民主独裁政治哲学的创始者,这就涉及到以情感为本体的浪漫美学方面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排斥的“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的政治方面。卢梭的《新哀洛绮思》以感伤的笔调、奔放的情感,开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是启蒙运动中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范导;同时,他的《社会契约论》宣布了人民主权原则与自由意志,但又为极权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是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施政的“圣经”。由此可以看出,浪漫主义思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在学术研究中既不能把它所涉及到的各个学科向度绝对地割裂开来,也不能把它们笼统地混为一谈。

以卢梭为创始者的浪漫主义美学,其情感主体的强化与政治革命、伦理判断等是非纠合在一起的。如若从现代性的视角审视卢梭,我们将发现对于人类文明的建构与解构这一巨大的对立集结于他的一身。虽然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到《社会契约论》,如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有着从个人主义走向专制极权主义的偏误,但他所奠立的个人权力、自由意志等毕竟凝聚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之中,成为至今未能动摇的人类遵循的共同准则,从这一向度来看,卢梭思想有其现代的价值立场,具有“历史现代性”的意义。但卢梭思想中更重要的是他对文明的解构,是其深层的仅为康德所读懂的“异化”内质:“卢梭之出现,使人们意识到,历史进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长与文明的负值效应两条对抗线交织而成。前一条线导向人类乐观的建设性行为,后一条线导向人类悲观的批判性行为甚或是破坏性行为。”^④这一解构与批判,即对现代性的反思,即“审美现代性”,它集中展现在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之中。

人类文明建构的乐观性、进取性的信念,在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中遭遇到第一次强有力的阻击:“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从埃及流传到希腊,说是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

① 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第5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0页。

②③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3、225页。

④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75页。

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一切,甚至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①以科学、艺术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一向是人类的骄傲,人类理性的标志,在卢梭这里成为新的“原罪”,成为被否定的异化现象,遭到了激烈的指控。文明的正值增长中所内含的负值效应被卢梭以一种矫枉过正的语言公开地暴露出来,人类第一次看清了自身两难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作出了这样的论定:“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②

因此,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浪漫主义的发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精神内质,决非“情感至上”一言所能概括。18世纪后半叶以来,为历史现代性所推崇的工业文明在经济领域创造了奇迹,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带来了物质的丰裕、社会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条件和物质享受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人类文明的正值增长所内含的自否定因素也日益呈现出来:“物欲”无限度地急剧膨胀,技术思维的单向、片面的隘化,人与自然的日渐疏离,商品交换逻辑渗透至生活及人的意识的深层,意识形态所涵盖的话语权力严密的控制,人类精神的“神性”和生存的“诗性”沦落、丧失……这些异化的现象引发了卢梭的忧虑及抗衡。他的美学的浪漫主义正是作为反思现代性的批判力量而出现,从这一前提来看,也可以说卢梭是对充满乐观主义信念的人类文明的解构。正如赫尔岑所揭示的:“当伏尔泰还为了文明跟愚昧无知战斗时,卢梭却已经痛斥这种人为的文明了。”^③对人类文明负值效应的忧虑、质疑与抗衡,才是卢梭“情感”的特定内涵,才是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的特定内质。

新人文主义宗师白璧德在抨击卢梭的浪漫主义时,曾涉及到浪漫主义概念的界定问题,他指出:“错误的定义大多是由于在多少近似的事实中,把实际上是次要的东西当成了主要的东西。例如,把向中世纪回归认定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事件,然而这一种回归只不过是表征,决非是原本的现象。浪漫主义的混乱与片面的确是起源于此——他们企图把并非处于浪漫主义中心的而是处于边缘的东西说是主要的东西,于是整个论题就不正确了。”^④我国文艺界历来忽略了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事件——对人类文明负值效应的忧虑与质疑,因为类似于“回到中世纪”、“回到自然”,或抗衡科技理性的“情感主体性”等,这些特质仅是由这一中心派生出来次要的、边缘的东西而已。

以卢梭为源端的这一浪漫美学思潮,历经康德、谢林、施勒格尔、诺瓦利斯、叔本华、尼采、里尔克,直至海德格尔、马尔库塞,“他们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人的本真情感的纯化,力图给沉沦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启明在西方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惨境中吟痛的人灵”。^⑤只有在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对峙中,在人类文明的建构与解构纠合中,在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抗衡中,也就是说,只有在宏大的历史性的语境中来审视,我们才能真切地理解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根本内质。

二、高尔基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

中国文艺理论界在接受西方浪漫主义概念上可分为两个时期,界分点约在1930年左右。在此

①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页。

②⑤ 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页。

③ 引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4页。

④ 引自罗成瑛:《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之前,所接受的主要是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在此之后,所接受的主要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了。

1920年,茅盾在介绍西方文艺派时写道:“讲到浪漫文学出发的地方,也就在法国。顶顶大名的哲学家卢骚(Rousseau)便是浪漫文学的第一人。”^①直到1927年,郑伯奇在评郁达夫小说集《寒灰集》时还写道:“19世纪浪漫主义的底流,依然是抒情主义,不过因为他们有卢梭的思想,中世文化的憧憬,资本主义初期的气势,因而形成了浪漫主义而已。”^②郑伯奇的原意是主张用“抒情主义”,而不是用“浪漫主义”的概念来概括郁达夫小说的创作特质,但在论析过程中透露出他对浪漫主义原初内涵的理解,即以卢梭思想作为核心。

西方浪漫主义的内涵在中国文论接受史上的转换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2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着金融崩溃、工厂倒闭、民众失业的衰败现象,人们则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因实施“新经济政策”而“空前繁荣”的苏联,敏感而激进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苏联的各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纲领、政策,都以一种神圣的、毋庸置疑的意味被无条件地接受下来。阳翰笙曾经回忆过他们那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心态:“我们有革命的理想和热情,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我们就搞,只要是列宁、斯大林的国家所做的事,我们就学起来。”^③1932年4月,斯大林为着加强对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解散了成立于1925年的最大的文学派别“拉普”,并于1932年10月底召开了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在会上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理论,其中对浪漫主义的概念内涵作了新的界定。其内容经周扬发表于1933年11月《现代》杂志上《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很快就在中国文艺界传播开来。

周扬根据会上吉尔波丁和古浪斯基(即格隆斯基)的报告,对“革命的浪漫主义”概念作了这样的介绍:“革命的浪漫主义”不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对立的,也不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并立的,而是一个可以包括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里面的,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加丰富和发展的正当的必要的要素。”^④这一“革命浪漫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在概念内涵上相去甚远。首先,它已经没有独立的哲学、美学意义了,因为它不能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对立”或“并立”,而只是“包括在”即隶属于后者的一个要素。也就是说,浪漫主义作为一个与现实主义比肩并立的思潮流派的独立资格被取消了,它缩小至仅为一种“元素”而已。其次,它的内涵和美学的浪漫主义完全不同了,卢梭那种对人类文明异化、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分裂的忧虑、质疑的内质定性完全被抛弃了。后者的内涵是由“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及“梦想的实现”等构成的,它的设立是为着阶段性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政治学的浪漫主义”。

这一政治学的浪漫主义虽然到1932年才正式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概念而确立,但它形成的源端却可追溯到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史》。1907年底,高尔基多次谈到他准备和卢那察尔斯基写一部给人民用的文学史;1909年秋,高尔基用这部著作对喀普里学校的听众讲授,其思想与观点开始在俄国、苏联,以及而后的社会主义国度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部文学史中,高尔基从哲学基点、政治倾向、创作方法等方面论述了他的文学观念,以及对18世纪以来俄国作家、作品的评价与判断。其中,他对浪漫主义的理解和新的界说均由政治基点出发,成为苏俄政治学浪漫主义的源端。

首先,在《俄国文学史》开篇,高尔基便确立了他的、也是而后苏俄文学理论体系的文学本质观:“文学

① 《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② 《郑伯奇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

③ 张大明:《不灭的火种——左翼文学论》“序言”,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④ 周起应:《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现代》1933年11月1日,第4卷,第1期。

是社会诸阶级和集团底意识形态——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现。它是阶级关系底最敏感的最忠实的反映；它利用民族、阶级、集团底全部经验来达到它的目的。”而对文学功能则定位为：“文学是阶级倾向底最普及、方便、简单而常胜的宣传手段。”^①文学本质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工具化，是苏俄文艺政策的主导倾向。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以历史的观点客观地看待它。因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区别于他种美学体系的质的规定性是：隶属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受制于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同时它也反向地起着巩固或者瓦解经济基础的功能，强调了艺术的政治功能。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非把艺术的政治功能单一化、绝对化，在审美向度上也强调了艺术的“自由的精神生产”品格和“高贵的天性”。马克思甚至谈到：“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②由此可以看出，从1908年的高尔基，到1932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及“革命浪漫主义”概念的确立，苏俄文艺方针基本上沿着片面的道路走向全面的政治功能化，它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思想有一定的偏离。

其次，在文学的哲学基点上，高尔基认为文学艺术和科学、哲学的对象客体是同一的。文艺与科学之间的区别仅在于：“文学使思想充满肉和血，它比哲学或科学更能给予思想以巨大的明确性和巨大的说服力。”即它们所反映的对象都是思想，所不同的，文学是以“肉和血”的形式来表现，哲学则是以抽象的形式来表现。这样，一般的哲学认识论便取代了艺术的审美认识论。

再次，在创作精神或创作原则上，高尔基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降格为创作方法，更把浪漫主义缩减为隶属于现实主义的一种元素。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是坚持物质现实第一性的：“在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之际，他们应该是严格的现实主义者，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现实的资料之上，而绝不是从心灵、从个人的经验来摄取思想体系的素材，像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者所做的那样。”^③因此，高尔基断言：“浪漫主义不是一种关于人对世界的态度的严整理论，它也不是一种文学创作理论；凡是要把浪漫主义阐释为理论的尝试，总不免或多或少搞不清而且徒劳无功。浪漫主义乃是一种情绪，它其实复杂地而且始终多少模糊地反映出笼罩着过渡时代社会的一切感觉和情绪的色彩。”^④浪漫主义仅是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情绪”，仅是一种“感觉的色彩”而已。

最后，从政治学的价值判断出发，高尔基把浪漫主义分为两种对立的概念：一是“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消极浪漫主义）：“对现实的极端不满，而显然是宁肯弃现实而取幻想与梦想，它企图把个人提到高于社会之上，企图证明个人乃是神秘力量的渊源，赋予个人以神奇的能力”；^⑤二是“社会性的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力图加强人的生活意志，在他心中唤起他对现实和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⑥消极浪漫主义不满现实、放弃现实，以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病态的幻想来躲避现实，所以是“反动”的；而积极浪漫主义充满社会主义理想，充满革命激情和反抗意志，所以是“进步”的。很明显，这两种分类完全是出自于政治性的动机。

三、两种浪漫主义的界分与中国文艺实践

在美学史上，浪漫主义是最复杂的课题之一。从空间上看，仅就初期来说，当时各国历史状况并不相同，法国侧重政治革命，德国侧重思想革命，英国侧重产业革命。因此，各国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就各呈异态。法国就有以卢梭为代表的抗衡人类文明异化的浪漫主义，以雨果为代表的反抗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浪漫主义；德国有康德、谢林、施勒格尔、诺瓦利斯等为代表的“浪漫哲学”或曰“诗化哲学”

①③④⑤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1、115、70、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7页。

⑥ 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

的浪漫主义;英国有华兹华斯、格勒律治为代表的感伤的浪漫主义,有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激情的浪漫主义。从时间上看,浪漫主义思潮纵贯三个世纪,它的许多美学要素渗入到当代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的思潮中去,构成血脉相连的关系,如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五四”时期称之为“新浪漫主义”)在对人类文明的建构与解构,在对科技与人文分裂的批判等问题上,都显示出它和早期浪漫主义的亲缘属性。在如此庞大的课题面前,本文为何只选择了其中两种浪漫主义进行论析呢?因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政治学浪漫主义在中国的美学、文艺学体系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像卢梭、谢林等所代表的美学浪漫主义几乎全被否定、被遗忘了。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我们对此无所觉察,因此,在中国的具体文艺实践中,就产生了一系列混乱的或令人困惑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只有在两种浪漫主义的对照和论析中才能得到相应的合理的解答。

其一,关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为何会被降格、减缩成创作方法问题。

这要从哲学的基点上展开论析。如前所述,高尔基认为文学和科学的对象客体是同一的,即思想,其不同之处,文学是以“肉和血”的形式来表现,哲学则是以抽象的形式来表现。这一立论,显然只是延续了别林斯基的观点:“哲学家以三段论说话,诗人则以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①而别林斯基这一理论则来自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黑格尔把科学、哲学、艺术等都断定为唯一的“绝对理念”在不同运动阶段外化的产物,它们只有形式变异,而无内容差异。黑格尔——别林斯基——高尔基——1932年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他们在这一哲学基点上是趋于一致的。而我国文学理论界主流从1930年到1980年,整整半个世纪所遵循的也是这一哲学观念。

既然对象的内容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形式,那么,文学在本质上就没有自身的独立性,即文学的审美自律性。马克思主义是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当唯物主义以绝对的权威君临一切,在文学艺术领域中以一般的哲学认识论吞并、取代审美认识论也就理所当然。循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思潮就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与资格,其作为形上层面的创作精神或创作原则的地位也就被取消了,它被贬低、下降成为隶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种“方法”而已。

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就是哲学领域里的浪漫运动,它成为文艺领域里的浪漫运动的理论基础。”^②以卢梭为起始后波及德国的浪漫主义原本就是一种人对世界与现实的把握、认识与判断,是一种哲学、美学思潮。高尔基为什么不顾客观存在的事实,断然否定了这一点呢?答案只能是一个,出自政治斗争的需要。因为如若承认浪漫主义是建基于某一哲学、美学体系上独立自存的创作精神或原则的话,那必然会出现与现实主义分庭抗礼的现象。但是客观现实斗争的尖锐与激烈,不能容许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有包容多元哲学体系的可能性。所以,首先要否定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精神或思潮的独立资格,把它降格、减缩,定位为“创作方法”,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方法”一词,其词典意义是指关于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等,偏重于具体操作的层面。把建基于哲学、美学体系之上的浪漫主义的思潮、精神,硬性纳入“方法”的范畴,在学理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这种不伦不类概念的设立,是苏俄文艺理论的一大发明,它贬低乃至取消了作家、艺术家的精神主体性,及其自由意志,把文艺创作变成隶属于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子系统,使文艺创作变成没有美学内质的、仅从属于哲学认识的一种“方法”。若按这一界定,马克思提出的艺术活动有着“高贵天性”、“作品就是目的本身”,以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及的“美的规律”等注重艺术创造的审美侧向,就被割裂、舍弃了,文艺完完全全成为政治斗争的“思想底最普遍而有效的宣传手段”。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429页。

②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23页。

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国内学界最早有所警觉并力图作出辨析的,是朱光潜先生。他在《西方美学史》中写道:“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流派运动,应该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精神实质上有区别的两种文艺创作方法分别开来。前者是文艺史的问题,后者才是美学的问题。”^①朱先生煞费苦心地对浪漫主义作出“文艺流派运动”和“文艺创作方法”的区分,说明他已注意到美学的浪漫主义不能与政治学的浪漫主义混同。由于受到上世纪60—70年代历史语境的限制,朱先生仍沿用“创作方法”的概念,仍被笼罩在当时意识形态的框限中。但忠于历史与真理的朱先生采用了迂回策略,巧妙地对浪漫主义作出两种形态的划分,既埋下了伏笔,也为今天研究的辨析预留了拓展的空间。

其二,关于“情感”、“想象”等因素在浪漫主义范畴中的地位。

现有的一般教科书都把情感作为浪漫主义的第一要义,但对情感、想象等为什么会成为浪漫主义的构成因素?美学浪漫主义的“本体论情感”和政治学浪漫主义的“感觉论情感”有何区别?以往文学理论界似乎尚未深入考察过。

如前所述,在法国,卢梭首先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异化现状,发现了文明建构的正值增长中的负值效应,喊出了叛乱性的文明解构的呼声。那么,工业文明与生存神性之间的对立将如何消解?卢梭认为最重要的应拯救“人的自然情感”。在德国,以康德为代表的哲人,悟解了卢梭的“异化”,又发现科学判断与道德判断的对立,发现现象与本体、经验与超验、有限与无限等一系列的对立。面对人类这种生存悖论,陷于困境之中的哲学家们把解决的任务交给了美学,也就是人类在以“知”、“意”把握世界之外,重新设立一个以“情”把握世界的范畴。以“情”(美学)作为沟通对立双方的桥梁,作为消解分裂的中介。“主体的感性诸功能被摆到一个异常重要的地位。单纯的思辨理性已经失去了权威,让位于信仰、情感、愉悦、想象一类的实践感觉。在以后的德国浪漫主义美学中,都无不强调超理性的想象、情感(爱)、灵性等个体的感性因素。”^②

德国浪漫诗哲们的情感之中包含着追求纯粹的神性及类似宗教感的终极关怀。以神性为内核的情感,把世界纯化了,经验的现象界与超验的彼岸以情感为中介趋近了,人的有限性生存与无限性的企盼在情感的流溢中沟通了。情感在美学的浪漫主义中,不仅是感受主体对外在客体是否符合自己需求而作出的肯定或否定的心理性反应及价值评判,它还具有把世界美化的功能,让人以诗的情趣栖居于大地上。

当世界的异化现状严峻地逼近了人们的跟前,客观的异己力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使“人的自然情感”慢慢丧失,人的诗意的生存状态也渐渐地被消解了。现代工业技术权威的树立使人文精神转向低迷,商品交换逻辑的渗透让人的尊严与价值沦落,庸俗的“散文化”的现实摧毁人们诗意浪漫的梦幻式向往。要从这一困境中解脱,拯救的希望只能回到人的自我本身,具有神性的、超验精神的人的自我及其情感性、主观性、想像力等,被美学的浪漫主义者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现实中的个体自我虽然是感性、经验的存在,但他可以通过主观情感上的信仰、意志、爱、想象、灵性等途径,取得诗意的生存,上升到超验的层面,从而趋近神性的完美,使有限的生命纳入无限之中,获得了生存的价值与意义。正如诺瓦利斯所说:“这个世界必须浪漫化。这样,人们才能找到世界的本意。浪漫化不是别的,就是质的生成。低级的自我通过浪漫化与更高更完美的自我同一起来。所以,我们自己就如像这样一个质的生成飞跃的系列。然而,浪漫化过程还是很明显的,在我看来,把普遍的东西赋予更高的意义,使落俗套的东西披上神秘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使有

①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720页。

② 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限的东西重归无限。这就是浪漫化。”^①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这样的高度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美学浪漫主义思潮强调情感、自我、主观及想象等的原因所在。

与此相对照,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政治学浪漫主义在情感内涵上和美学浪漫主义之间就显示出巨大的反差。后者把情感提升到“神性”的层面,具有宗教信仰的意味;前者则贬抑情感,或是把情感和浪漫主义减缩到可有可无的地步,或是在内涵上以“理想”取代了情感。浪漫主义在高尔基眼中处于极度卑微的地位,它既不是“人对世界的态度”,也不是“创作理论”,卢梭那种俯视人类文明异化的宏大的历史观更谈不上,它仅是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情绪”,仅是一种“感觉的色彩”而已。高尔基甚至谈到,他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勉强使用这一概念:“各位不要因我把浪漫主义这名词应用到无产阶级的心理上面而感到困惑;我使用这个名词——因为没有别的名词好使用——仅仅限于指无产者底崇高的战斗情绪而已。”^②由于没有别的名词好用,才将就用之。所以,在政治学浪漫主义的范畴中,连浪漫主义概念本身都是无足轻重的,就更谈不上情感、情绪或想象的地位了。

但直到今天,国内文学理论界仍把这两种浪漫主义的情感——“本体论情感”和“感觉论情感”混为一体,以至于在对具体作品的实践性理论分析时产生误导与误读的现象。把浪漫主义分为“积极”与“消极”两大类,就是实证。

其三,关于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的界分问题。

在国内文学理论界,把浪漫主义思潮界分为积极与消极两大类,由来已久,它仿佛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时至今日,一些文学研究者仍然沿此惯例使用这一概念。

在西方美学史上,高尔基第一次把浪漫主义割裂、界分为两大类。其中一派“充满着病态地提高的敏感和过分地发展的幻想,这一派是消极的,它除了想倾吐莫名的忧虑,或者有时表现对那到处包围着人、窒息着人的不可知力量的恐怖心情以外,便再没有别的使命了”。^③正因为如此,它具有“反社会的、因而亦是反动的意义”。另一派具有积极的战斗性质,“这种浪漫主义刚好在生长,刚好在形成;我们看到它的温床就是下述这流人物:他们或者是主张从资本主义魔爪中解放全人类这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导师,或者是提倡世界大同和自由劳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的宣扬者,他们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参与生活”。^④高尔基把“积极浪漫主义”的标准原本定得很高,只有无产阶级的导师或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家才够得上,后来才逐步扩展为凡是“加强生活意志,唤起反抗激情”的都可列入。

积极与消极两种浪漫主义的界分不仅来自政治态度,而且仍然和对现实的哲学把握有关。1934年,日丹诺夫在《苏维埃文学》中指出:远离现实生活、表现乌托邦的幻想世界,则是旧的、消极的浪漫主义。苏维埃文学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为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积极的亦即革命的浪漫主义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而进入,这样,“彻底务实的实践精神与远见卓识、永远向前的动力”便结合起来,这就是积极浪漫主义的功用。^⑤对于这种“务实”与“远见”的结合,斯大林有一形象的说法:“一位真正的作家看到一幢正在建设的大楼的时候,应该善于通过脚手架将大楼看得一清二楚,即使大楼还没有竣工,他决不会到‘后院’去东翻西找。”^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务实”的,但这种务实不允许像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样专注于社会的缺陷、不足,乃至阴暗的一面,即“到后院去东翻西找”。它纳入积极浪漫主义的用意,就是要求作家在反映现实的同时,还必须有“远见卓识”,即“善于通过脚手架将大楼看得一清二楚”,在发展、建构的过程中就已经看到前景、目标的光辉、灿烂。而后,

① 刘小枫,《诗化哲学》,第33页。

②③④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第114、71、114页。

⑤ [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8页。

⑥ 倪蕊琴编,《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页。

“远见卓识”就以“理想”一词替代之。这就是“理想”成为中国文论中浪漫主义概念的重要内涵之一的原因。这种理想性的色彩,在1958年的中国则发挥到了极致。在这样的积极(革命)浪漫主义的引导下,也才有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十五年赶超英美”的声势浩大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积极”与“消极”两种浪漫主义概念的命名,其深层是“进步”与“反动”对立的政治性的价值判断。但若以这种“非此即彼”的政治判断,来取舍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时,对文学遗产、文学传统扫荡式的否定就开始了,而后社会主义国度在文学艺术上的极左思维也由此发端。例如,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不仅把爱·伦坡当作消极浪漫主义者加以否定,甚至对果戈理这样的大师也予以批判。对于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虽然认为他非自主地、客观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但“他的使命,是替贵族寻找在生活中应有的地位。……他,消极的人生态度的宣传者,也不得不在《复活》中承认,而且几乎是证明了积极斗争的正确性”。^①“消极”的托尔斯泰仅是从反向的角度证明了介入“积极”政治斗争的正确。这对于托尔斯泰著作所具有的巨大意义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

在中国文学界,由于沿用苏俄的“积极”与“消极”的两种浪漫主义概念,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于传统文化,对于作家、作品的判断、取舍也陷入了巨大的误区。文学作品如若涉及到这些区域:对生命有限性的思考、对死亡之谜的追问、对人类生存意义的解索、对个体情爱的披露自恋、对异化现象的揭示抗衡、对精神家园的向往追寻……凡是属于非现实性的哲学、美学思考,非历史唯物主义所能涵容的精神性的困惑,皆被冠以“消极”、“颓废”、“悲观”,乃至“反动”的前缀,予以否定、扫荡。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沈从文了。1980年之前,国内的现代文学史是没有沈从文的席位的,原因正来自这种不容分说的“积极”和“消极”的褒贬取舍,来自意识形态权力的制控。沈从文的美学观念从内质上和卢梭的美学浪漫主义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他自称“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一个“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的作家,一个“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慎谨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的诗人。^②正因如此,1980年之前,国内现代文学界对他“封杀”的,以至于他在美国演讲时,戏称自己为“文物”。而后,在论及沈从文时,却多把他归为“乡土文学”一类,对他自封为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的称谓避而不谈。考察起来,其中的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如李欧梵所指出的,大陆学者不理解“艺术现代性”的内涵。李欧梵在论及鲁迅、郁达夫对现代性的不安或不满,以及对“死”的意义和情绪的表述时,提出这样一种研究状况:“这两位作家的颓废面,大陆一般学者都不敢正视,或故意曲解,其原因除道德因素外,主要是在中国的现代文学理论中并没有把颓废看成‘现代性’的另一面。”^③这里的“现代性另一面”,即是指反思、抗衡“偏重科技的发展及对理性进步观念的继续乐观”的“艺术现代性”,前述的美学浪漫主义思潮即是这种现代性观念中的一种。质疑历史进步的所谓绝对性、乐观性,并不等于反动;思索死亡与生存的对立的哲理意念也不能与消极、颓废等同。当现代性理论范畴尚未被中国现代文学界所完全接纳之际,连对鲁迅都产生误读,更何论沈从文。二是本文揭示出的美学的浪漫主义被政治学的浪漫主义所排斥与取代。1933年,当苏俄的隶属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为中国文学界所接纳之后,浪漫主义的内涵已和革命、理想等一体化了。不论是建国之前或以后,这种浪漫主义的桂冠只能赋予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类作家与诗人,并形成历史上约定俗成的“惯例”性论断。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像沈从文这样“对政治无信仰”的、毫无“革命”性的、“消极”的作家,理所当然地被排斥在政治学的浪漫

①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第6页。

② 《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4页。

③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9页。

主义之外,而他所赖以生存的美学的浪漫主义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控中销声匿迹了。实质上,郭沫若与沈从文就代表了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与美学的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界的两种不同的命运。

(责任编辑:任天)

Romanticism of Aesthetics and Romanticism of Politics

Yu Zhaoping

Abstract: There were two major categories of Romanticism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 e. , a “romanticism of aesthetics” represented by Jean Jacques Rousseau, and a “romanticism of politics” represented by Maxim Gorky. The connotation of the former emphasized to worry about, to question and to resist the negative effect brought abou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 while the latter takes romanticism as an element affiliated to “socialist realism” and an instrument of political idololgy. Since 1930s, romanticism of politics in China has repelled romanticism of aesthetics and replace it,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perplexes in specific practice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fact, Guo Moruo and Shen Congwen represented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t destinies of these two romanticism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Key words: romanticism, aesthetics, politics, alienation

(上接第 49 页)

都必须遵守。由于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文化资源、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现代化不能完全采取西方模式,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①所以,在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研究中,要以中国现代化为背景,重视在现代

化的背景下来研究我国的新型工业化。

(责任编辑:沈敏)

① 洪银兴:《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经济学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A Review on Industrialization Theory in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Ren Baoping & Hong Yinxing

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is a kernel issue in the studies of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Since 1940s, 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studied theoretically the 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le in policies proposed an emphasis on industrialization. Ever since 1980s, there has been a new development in the studie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differences are explained for the experie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standards for a successful industrialization are put forward. The achievements of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have been studied. The reform of environment tax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analysed. To sum up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new progress in 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studies of the way for Chinese new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